

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评述*



李小荣^{1,2} 叶楚豪¹ 马海涛³

(1.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北京 102206;

2. 中财-中证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北京 102206;

3.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控市场、激励企业投资和创新的重要手段,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是历久弥新的热点话题。近年来,由于在因果推断方面的优势,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研究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日益增加。本文从国内外经济、财税、金融、会计领域的重要期刊中筛选代表性文献,对涉及的重要税收政策和企业行为进行归类,搭建理论框架,全面梳理并总结现有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基于准自然实验,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了企业税收政策、税收征管政策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税收政策对企业财务决策、信息披露、纳税行为、企业行为综合表现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税收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入、创新和企业纳税行为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未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后续研究展望,以期推动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领域研究的高质量发展,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进一步指导。

关键词: 税收政策 企业行为 准自然实验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2)10—0190—1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财税改革。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建立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税制度体系框架,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地区协调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制度性的奠基(刘克崧,2009)^[1];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保护国内经济,我国首次提出减税降费政策,此后十余年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减税降费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马

收稿日期:2022-04-09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劳动力投资:影响、作用机制与综合效果”(7197219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债制度改革与企业劳动力投入:基于新《预算法》的准自然实验”(72272166);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项目“CEO权力、股价崩盘风险与股价同步性”(161077)。

作者简介:李小荣,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为资产评估、公司财务、政企关系与企业税收,电子邮箱:lixiaorongchina@163.com;叶楚豪,男,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企业税收,电子邮箱:yechuhao@yeah.net;马海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财税理论与政策,电子邮箱:mahaitao0511@163.com。通讯作者:李小荣。

海涛等,2020)^[2];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我国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和留抵退税政策,旨在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由此可见,财税改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西方有关财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理论十分丰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在经济萧条背景下,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干预,刺激有效需求,可以增加就业,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但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出现的滞胀问题,凯恩斯主义逐渐被摒弃。随后兴起的供给学派(美国自由经济学派)认为,减税政策能刺激居民就业和企业投资,增加供给,税率虽然降低,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税基,反而能促进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税收楔子”学说认为政府税收在资本供求关系曲线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使得供应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偏移导致无谓的社会总收益减少。基于上述理论,大多数西方国家实施了减税政策,希望通过激励企业投资和研发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减税政策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如何提高减税政策效率成了政府、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涌现了大量税收政策实施效果和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现有文献主要通过现金流理论、权衡理论、信号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MM 理论等解释不同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运用实证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Hanlon 和 Heitzman(2010)^[3]呼吁关注税收政策对企业真实决策的影响。

由于准自然实验研究方法在因果推断方面的优势,采用该方法的实证文献日益增加。传统计量方法评估税收政策的经济后果面临两项挑战(Ljungqvist 和 Smolyansky,2014)^[4]。首先,税收政策在颁布和实施过程中受到经济发展条件或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传统研究方法无法从观察到的混杂效应中有效分离政策效应。其次,税收政策的反事实结果无法观测,无法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准自然实验研究方法利用政策颁布作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法或断点回归法分离政策处理效应,构建反事实结果,评估政策实施效果,较好地克服了传统计量方法的缺陷。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借鉴国内外税收改革经验,总结以往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对税收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激发疫情影响下的企业活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选取来自 CSSCI 和 UT Dallas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的近十年(2011—2021 年)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研究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代表性文献,通过搭建理论框架,有逻辑地对现有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指出研究不足,提出后续研究展望。本文涉及的税收政策为广义概念,既包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营改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税收政策,也包括纳税信用评级、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省直管县改革等与税务主管部门的税收征管行为有关的财税政策,还包括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 48 号解释等涉税信息披露政策。表 1 统计了本文所选文献的来源期刊和数量,涉及经济、财税、金融和会计领域,选择这些期刊发表的文章,主要基于文章质量的考虑,限于时间和精力,本文没有对所有期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表 1 文献来源期刊和筛选后篇数(按 2021 年期刊影响因子排序)

中文期刊	篇数	英文期刊	篇数
中国工业经济	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
经济研究	1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
管理世界	10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5
金融研究	3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
中国社会科学	1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
南开管理评论	1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
会计研究	15	The Journal of Finance	3
经济学季刊	7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6
世界经济	14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

续表 1

中文期刊	篇数	英文期刊	篇数
财贸经济	12	Management Science	1
审计研究	1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	9
经济管理	1	The Accounting Review	9
财政研究	19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
税务研究	25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
管理科学学报	2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3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y	7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3
	131		91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税收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为了更好地梳理总结现有研究,本文首先对税收政策和企业行为进行了归类。在税收政策方面,将税收政策归类为企业税收政策、税收征管政策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税收政策。在企业行为方面,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理论和方法,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企业行为,例如经济学主要关注了税收遵从、税收负担、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最优税制等话题,而金融学主要从 MM 理论出发,关注了税收对企业价值、企业财务决策和投资组合决策等话题(Hanlon 和 Heitzman,2010)^[3],本文充分结合各学科理论、重点研究内容和已有文献涉及到的企业行为,将企业行为概括为企业财务决策、信息披露、纳税行为、企业行为综合表现和其他行为五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检验角度整理归纳了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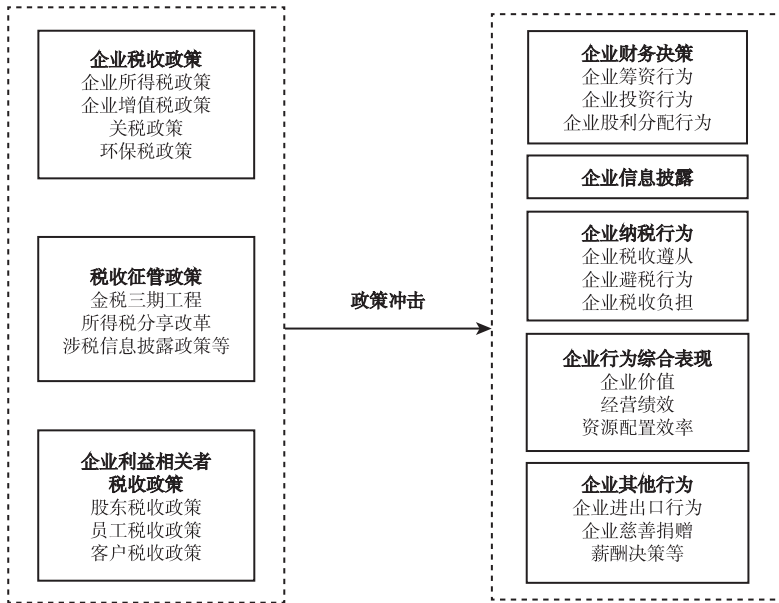


图 1 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企业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

利用企业税收政策颁布和实施作为外生事件,现有文献考察了各项企业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

的影响。根据税收政策所涉及的税种差异,可归纳为企业所得税政策、企业增值税政策、关税政策和环保税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1. 企业所得税政策与企业行为

(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行为。我国早在 2004 年就推出了针对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企业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4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对生物药品制造业等六个行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5 年将该政策扩展到轻工、纺织、机械、汽车四个领域的重点行业,并于 2019 年扩展到全部制造业领域。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允许企业对新购置的固定资产采取加速折旧的方式计算折旧额,增加了企业固定资产购置初期的折旧额,减少了购置后期的折旧额,从而降低了企业在购置初期的所得税负担,并相应地增加了企业在购置后期的所得税负担。与原来适用的直线折旧法相比,加速折旧政策改变了企业现金流,相当于为购置固定资产的企业带来了一笔额外的无息贷款(刘啟仁等,2019)^[5],并在随后几年逐步偿还,这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筹资行为和投资行为,并间接影响了企业的综合表现。

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企业筹资行为的影响主要基于两种理论。第一种是依据 Modigliani 和 Miller (1958)^[6] 含税条件下的资本结构理论(MM 理论),在含税条件下,企业债务存在所得税的“税盾”效应,由于企业债务利息将在纳税前扣除,因此当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时,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化,倾向于提高债务融资比例。第二种理论则从企业现金流角度,解释税收政策对企业筹资行为的影响。减税政策能降低企业税负,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现金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证检验结果主要支持了第二种理论。尽管有理论认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仅仅改变了企业的现金流,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不太明显,但是近年来的实证结果仍一致表明该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加速了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刘啟仁等,2019)^[5],激励了企业研发投资,提升了企业创新产出(刘诗源等,2020)^[7],提升了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和占比(刘啟仁和赵灿,2020)^[8]。

现有文献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结构和债务风险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尚存在一定的分歧。范文林和胡明生(2020)^[9]指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促进了企业的长期投资,而企业的长期借款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企业存在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短贷长投”现象,面临更大的债务风险。而申慧慧和于鹏(2021)^[10]发现该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期投资影响不显著。导致两者研究结论出现分歧的可能原因在于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定义不同。

在企业行为综合表现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导致固定资产对低技能工人的替代,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李建强和赵西亮,2021)^[11],企业投资机会敏感度增加,提升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刘行等,2019)^[12]。有学者发现该政策虽然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但是盲目且低效率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企业产能过剩、产品滞销等问题,无法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刘怡等,2017)^[13]。

美国联邦政府为企业购买规定类型的设备提供了当期的额外折旧抵免政策,该政策生效于 2001 年,规定购买设备的企业可按购买价享受当期一次性 30% 的折旧抵免,又于 2003—2004 年期间将抵免比例上调至 50%,2008 年 50% 的抵免政策被恢复,并于 2010 年至 2011 年将抵免比例提升至 100%。已有实证研究发现该政策刺激了企业投资(Zwick 和 Mahon,2017)^[14],但在刺激效果上,折旧抵免方式对企业的激励作用比税率下降方式更小(Park,2016)^[15]。还有研究发现英国 2004 年提高中小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适用门槛政策也显著提高了受惠企业的投资规模(Maffini 等,2019)^[16]。Guceri 和 Albinowski(2021)^[17]则利用荷兰两个非常相似的加速折旧政策,发现不同经济环境下政策效果存在差异,经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行为。中文文献主要关注我国 2015 年《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和 2017 年《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号)两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前者规定除负面清单行业以外,所有企业都可以享受研发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后者则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提高研发费用扣除比例,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负,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筹资行为和投资行为,间接影响了企业的综合表现。

实证结果表明,2015年政策降低了医药制造企业的企业税负,促进了企业杠杆率的降低,推动了企业负债结构的调整(袁业虎和沈立锦,2020)^[18]。在投资行为方面,实证检验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崔也光和王京(2020)^[19]发现2015年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支出,而梁富山(2021)^[20]发现2017年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制造业重点行业研发净效应不显著。由此可见,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不同行业、税收优惠形式可能会影响政策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研究。2015年政策通过促进企业创新、降低经营成本和提升内源融资能力三条路径有效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王玺和刘萌,2020)^[21]。

英文文献研究了加拿大2004年更改科学研究和实验开发税收抵免资格规则、挪威2002年引入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和英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改革等有关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均发现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研发行为的促进作用。

(3)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与企业行为。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我国2008年颁布了《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办法》,根据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高科技产品销售比重、员工高学历占比、研发人员比重等标准对企业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将认定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5%降至15%。该政策一方面激励了企业提高创新投入,促进了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即“激励效应”;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所得税优惠,部分企业可能会通过操纵虚假的研发投入记录达到认定门槛,即“迎合效应”(杨国超和芮萌,2020)^[22]。

实证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同时也发现了企业通过向上调整研发费用,以达到享受减税政策门槛的证据(杨国超和芮萌,2020)^[22]。在此基础上,Chen等(2021)^[23]通过结构估计和聚束(Bunching)方法,发现在税收激励门槛出现缺口,即企业确实存在为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而进行费用操控行为,同时,排除了虚增研发投入的企业,并估计了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实际影响,通过结构估计模拟了不同政策形式下的政策效果。

(4)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与企业行为。我国2008年颁布的所得税法规定,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减按20%缴纳企业所得税,在此基础上,2009年,新政策规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的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随后的2011年—2018年间,政府多次加大优惠政策力度,将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门槛由3万元逐步提升至100万元。通过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形式,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经营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小微企业的较快发展。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调查数据包含了每年抽样调查的不同规模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纳税情况,得益于此,部分学者检验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系列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纳税行为和企业行为综合表现的影响。

小微企业减税政策增加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但对研发支出增加不显著(魏紫等,2018)^[24]。小微企业减税政策也显著提高了企业纳税遵从度(李昊楠和郭彦男,2021)^[25]。应用聚束(Bunching)方法分析,该减税政策影响下,应税收入3万元和6万元周围企业的应税收入弹性较高,而应税收入30万元周围企业的企业弹性较低(李昊楠,2021)^[26]。在企业行为的综合表现方面,该政策降低了小微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了企业净利润(魏紫等,2018)^[24],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樊勇等,2020)^[27]。

英文文献检验了对小型公司的信息通信支持的所得税抵免政策和1996年巴西实施的官僚机构简化和减税计划(Business Tax Reduction and Simplification Scheme, SIMPLES)对企业行为的影

响。英国于2000—2004年实施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向小型公司的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提供了100%的税收抵免。该政策提高了企业对有关专业人才的雇佣,显著提高了工资水平(Gaggl和Wright,2017)^[28]。

1996年巴西实施的SIMPLES政策将小微企业所得税等多项税费采取每月一次性支付的简化征收方式,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基于此,Fajnzylber等(2011)^[29]和Rocha等(2018)^[30]发现SIMPLES政策降低了企业注册成本,促进了非正式公司的正式化^①,但给政府带来了税收净损失。Monteiro和Assunção(2012)^[31]则发现SIMPLES政策主要促进了小微零售企业的正式化。但是,Piza(2018)^[32]认为SIMPLES政策对企业正式化率的影响可能被变量的测量误差和季节性冲击所混淆,该政策并不影响企业的正式化速率。通过梳理研究所用数据,发现以上四篇文献所用数据不尽相同,包括巴西劳动部的行政数据、月度就业调查的个人数据、巴西统计局的非正式部门调查数据,由于非正式的小微企业较为隐蔽,数据难以保证完整,因此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采用对研究结果存在影响。

(5)2008年中国所得税法与企业行为。运用双重差分法,现有文献主要实证检验了新所得税法中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简称“两税合一”)、扩大企业慈善捐赠抵税范围和资本弱化税制四项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一般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税率由33%降至25%,所得税税率的降低通过优化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郑宝红和张兆国,2018)^[33]。两税合一政策颁布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内资企业,部分企业通过调高外资股权比例,以达到享受外资税收优惠的目的(包群等,2020)^[34]。两税合一政策颁布后,外资企业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出现了更多的避税行为(毛程连和吉黎,2014)^[35],而部分内资银行面临更低的所得税税率,充实了银行资本,提高了资本质量,促进了信贷扩张(刘冲等,2021)^[36]。新所得税法中的扩大企业慈善捐赠抵税范围政策直接影响了企业捐赠行为,该政策扩大了捐赠的抵扣范围,降低了企业捐赠成本,提升了企业捐赠规模(曲顺兰和武嘉盟,2017)^[37],但对企业捐赠倾向的扩展作用有限(彭飞和范子英,2016)^[38]。新所得税法还限制了企业超出规定标准的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有效地规制了部分外资企业的资本弱化避税行为(黄炳艺等,2020)^[39]。

(6)2004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The American Jobs Creation Act, AJCA)与企业行为。为了保护美国国内制造企业,提升出口竞争力,美国1971—2004年间推出了三次税收激励政策^②(Ohrn,2018)^[40],但是这三次税收激励政策均被国际贸易协定组织WTO(包括其前身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裁定为非法,并对美国进行关税惩罚。为了阻止处罚,并引入一种收入中立和合法的替代方案,美国2004年的AJCA法案引入了国内生产活动扣除政策(Domestic Production Activities Deduction, DPAD),该政策为在美国生产的商品或工作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同时AJCA法案中还包括了国内投资法案(Homeland Investment Act, HIA),为跨国公司利润汇回国内提供免税期,以增加国内投资(Lester,2019)^[41]。

DPAD政策有效降低了美国国内生产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给企业带来额外现金流,影响了企业的财务决策和纳税行为。DPAD政策降低了国内制造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为企业提供了

① 企业正式化(formality)是指处于非正规经济之中的小微企业加入政府法律和监管体系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在工商部门的正式登记注册、向税务部门纳税和与员工签订合同等行为,企业非正式化减少了税基,造成了税收扭曲,影响了资源配置。因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激励非正式企业的正式化是一个难题。

② 分别为Domestic International Sales Corporation(DISC,1971—1984年有效),DISC允许公司递延出口收入的50%,递延金额在分配时只需缴纳股息税。且如果出口收入被再投资到国外,美国对这些收入的税收将被永久递延;Foreign Sales Corporation(FSC,1984年—2000年有效),FSC允许美国出口商的外国子公司在不引发美国纳税义务的情况下将出口收入汇回国内。Extraterritorial Income Exclusion(ETI,2000—2004年有效),ETI政策允许出口商从其美国应税收入中扣除出口收入的15%。

资金,企业降低了债务率,增加了企业投资,增加了股利支付(Ohrn,2018)^[40]。同时,企业资本投资的增加,伴随着劳动力投资的减少,出现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Lester,2019)^[41],DPAD政策还影响了企业的并购活动,从该政策中受益的公司增加了并购的金额和质量(Blouin等,2021)^[42]。

HIA法案是2004年的AJCA法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法案为跨国公司将海外利润汇回提供了一个临时的免税假期,在假期内只对海外汇回利润的15%征税,且15%征税部分可以抵扣已在海外缴纳的所得税。海外利润汇回税减免政策降低了企业海外利润汇回的税收成本,激励了企业海外利润的汇回,影响了企业财务决策行为。实证研究发现,HIA法案为跨国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动机,促进了企业海外利润的汇回(Desai等,2016)^[43]。关于HIA法案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Dharmapala等(2011)^[44]发现HIA法案并没有促进企业对国内投资,而是促进了股利支付,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Faulkender和Petersen(2012)^[45]改进了Dharmapala等(2011)^[44]的识别策略,发现该政策有效促进了处于融资约束公司对国内的投资,而对未处于融资约束下的企业没有影响。同时,HIA法案提升了跨国企业在美国国内竞争力,得到税收优惠的企业增加了投资支出、专利活动和机会性招聘行为(Grieser和Liu,2019)^[46]。

(7)美国各州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交错变化与企业行为。由于美国各州所得税税率变化存在随机性,各州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存在时间和位置上的交错变化,是准自然实验研究较为理想的设置。部分学者以税率变化州为处理组,其相邻州作为控制组,控制其他因素的变化,研究所得税税率变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当税率增加时,企业减少了创新支出和新产品产出(Mukherjee等,2017)^[47],增加了搬迁总部的可能性(Chow等,2022)^[48]。当税率降低时,企业增加了创新数量和质量(Atanassov和Liu,2020)^[49]。税率变动还不对称地影响了企业风险承担,当税率增加时,受到债权方的压力,公司通过改变运营周期和降低研发风险来降低企业风险,而当减税时,企业没有反应(Ljungqvist等,2017)^[50]。所得税税率变化还影响了银行的借贷行为,一方面,银行所在州的所得税税率改变后,银行将小企业贷款向未受影响的州分配(Smolyansky,2019)^[51];另一方面,银行根据借款人所在州的银行所得税的增加提高了贷款利差(Kang等,2021)^[52]。

(8)日本和英国所得税全球税制改革与企业行为。2009年日本和英国宣布所得税由全球税制转为属地税制,取消对跨国公司从低税率国家汇回的利润征税。该政策降低了跨国企业从低税率地区利润汇回成本,影响了企业财务决策和纳税行为。实证结果发现,该政策降低了跨国企业对低税率地区的投资成本,提高了受益企业的竞争力(Kohlhase和Pierk,2020)^[53],促进了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行为(Feld等,2016)^[54],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Amberger等,2021)^[55]。同时,该政策也为跨国公司提升了利用转让定价进行税收筹划的税收收益,因此转变为属地税制国家的跨国企业转让定价行为大幅增加(Liu等,2020)^[56]。

(9)其他企业所得税政策与企业行为。从关注的政策类型看,中文文献主要还关注中国2001年开始部署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2010年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税收优惠政策、2010年针对离岸外包企业的税收优惠、2017年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等其他针对特定区域、特定企业类型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而英文文献则侧重于对加拿大2006年对具有特殊构架的收入信托公司征税政策、比利时2006年权益税盾名义利息扣除额(Notional Interest Deduction, NID)立法、巴基斯坦2009年对合伙制企业增税改革、美国堪萨斯州2012年允许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适用个人所得税的所得税改革等对不同类型企业所得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同时,对其他税收政策的实证检验结果也为现有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撑,基于2006年加拿大对具有特殊构架的收入信托公司征税政策,Doidge和Dyck(2015)^[57]发现所得税税率的提升导致企业增加了债务税盾的使用,这为企业债务的“税盾”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

2. 企业增值税政策与企业行为

(1) 增值税转型改革与企业行为。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制的第一大税种,大量文献研究了2004年至2009年逐步推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增值税转型改革通过允许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抵扣,避免了重复征税问题,实现了增值税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该政策于2004年首先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试点,2007年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南等中部六省,2008年试点扩围至内蒙古东部和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并覆盖到几乎所有行业,2009年该政策在全国各行业推广。

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将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一次性全部扣除,降低了企业增值税税负,为企业提供了资金,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了企业负债结构(申广军等,2018)^[58],促进了企业创新(刘行和赵健宇,2019)^[59]。实证研究还发现增值税转型政策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的购买成本,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许伟和陈斌开,2016)^[60],但也有文献得出了不同结论。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所研究政策同时实施的其他政策可能会影响政策效果的检验,对2004年在东北三省实行的增值税转型政策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同时期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能有效地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而增值税政策不仅未起到促进作用,其存在反而可能削弱所得税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刘怡等,2017)^[13];另一方面,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效应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来自企业外部的、伴随着减税政策而来的非税负担上升可能会抑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赵仁杰和范子英,2021)^[61],而来自企业内部的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影响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效果(李成等,2016)^[62]。政策导致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还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谢申祥和范鹏飞,2020)^[63]。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也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企业出现了劳动需求减少的现象(王跃堂和倪婷婷,2015)^[64]。政策导致的增值税负的降低还促进了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蒋为,2016)^[65]。

(2) 营改增与企业行为。为减少流通环节的重复征税,我国2012—2016年逐步推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简称“营改增”)。2012年1月,上海启动了对部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下半年试点范围扩展至北京等八个省(市),2013年8月,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开,广播影视作品相关行业被纳入试点,2016年5月,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行。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2011]110号)规定“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基本消除重复征税”。然而,增值税易转嫁的特点导致了营改增政策对不同议价能力、不同行业的企业税负的影响并不一致,转嫁能力越强的企业,更能从营改增政策中受益,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入和劳动力投资,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利润情况(李成和张玉霞,2015)^[66];申广军等,2016^[67])。此外,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同样存在财政压力提升,导致企业非税负担上升的情况(彭飞等,2020)^[68]。除此以外,营改增通过打通企业购买服务的增值税进项抵扣链条,避免营业税的重复征税,有利于降低与服务业企业的交易成本,强化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促进企业上下游之间、跨地区贸易活动的增长(陈钊和王旻,2016)^[69],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使用(岳树民和肖春明,2017)^[70]。

(3) 增值税税率变动与企业行为。部分文献关注了增值税税率变动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理论上,增值税税率降低能够减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对外投资,但是由于增值税易转嫁的特点,减税效应可能会因议价能力的不同,而使得企业受益程度不同(Jacob等,2019)^[71]。Benzarti和Carlioni(2019)^[72]、寇恩惠等(2021)^[73]分别基于法国2009年降低堂食餐饮服务增值税和中国2009年采矿业增值税税率改革,分别测算了餐饮减税政策下消费者、员工、原材料供应商和餐饮业主的受益情况,以及采矿业增值税税率变化导致下游企业、企业所有者、企业员工和中间投入供应商税

负承担情况,直观展现了增值税税率变动的政策效应因各主体议价能力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4)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与企业行为。2011 年开始,我国陆续在特定行业、特定领域实施的留抵退税改革,2018 年,对全国先进制造业等行业试点实施留抵退税改革,2019 年政策试点范围扩展至全行业,并逐步加大了退税力度。留抵退税改革适应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促进市场资源有效配置。该政策的实施后,税费的返还刺激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正面影响(吴怡俐等,2021)^[74]。

(5) 出口退(免)税流程优化与企业行为。税务部门出于遏制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行为,加强了对出口退税的审核,这导致审核流程较长,退税速度降低,影响了出口企业资金流转。随着退税管理效率的提升,我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出口退税流程优化举措。出口退税流程的优化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Chandra 和 Long,2013)^[75]。

3. 关税政策与企业行为

我国于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并承诺减让关税,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现有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将导致进口市场竞争加剧与出口市场需求的增加,影响进出口企业的行为。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加入 WTO 后中间品关税的大幅下降,提高了进口企业利润,增加了研发投入和产出(田巍和余森杰,2014)^[76],进口竞争的加剧还倒逼了国内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并提升环境绩效(邵朝对,2021)^[77]。同时,关税的降低也导致了出口市场的需求增加,出口企业显著提高了成本加成定价能力,促进了就业净增长(毛其淋和许家云,2017)^[78]。

4. 环保税政策与企业行为

2018 年我国正式实施《环境保护税法》,改变了 1982 年以来以征收“排污费”为主的环境治理体系。正如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所揭示的,环境税的本质在于不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和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收费或征税的方式能实现企业负外部性成本的内部化,迫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润的过程中必须控制排污规模。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陈建涛,2021)^[79]。政策的实施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产权的企业影响存在差异,总体而言环保税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明显(金友良等,2020)^[80]。我国的绿色税制是由多种涉及环境和生态的税种组成的,近年来,我国消费税、资源税等有关保护环境的绿色税制的建设还在不断推进,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索。环保税政策还影响了企业生产决策行为,Klier 和 Linn (2015)^[81]检验了法国、德国和瑞典三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政策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短期内出现了企业销量的下滑,但是制造商并没有因此改变其制造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率。

三、税收征管政策与企业行为

税收征管政策导致了税务当局征管强度的变化,这直接影响了企业避税成本,从而间接影响了企业财务决策、信息披露和企业行为的综合表现。本部分的税收征管政策为广义概念,既包括金税三期工程等由税务部门实施的直接税收征管政策,也包括企业涉税信息披露政策,还包括省直管县、取消农业税等会间接影响税务部门征管强度的财税政策。

1. 金税工程三期与企业行为

我国的金税工程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流转税制改革,前后经历了三期的建设与完善。金税工程三期(以下简称“金税三期”)的建设是我国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成果。金税三期工程搭建的信息系统通过收集整理企业各项经营信息,分析评估企业纳税情况,有效提升了税收稽查效率,增加了企业逃税难度。金税三期工程 2013 年起开始在三省(市)试点,随后 2014 年和 2015 年逐步增加试点省份,并于 2016 年实现全国范围覆盖。

金税三期的实施显著影响了企业纳税行为。一方面,金税三期提高数据源的信息透明度和征

管分析能力抑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了企业税收遵从度(李增福等,2021)^[82]。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对企业税收负担并没有显著影响。有学者认为金税三期的推出既促进了“应收尽收”,还促进了税收优惠的“应享尽享”,因此企业税负并无显著影响(樊勇和李昊楠,2020)^[83]。另有学者则主张金税三期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销项税和进项税,增值税总体税负无显著变化(李艳等,2020)^[84]。但是,金税三期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促使企业通过社保缴费转移税收压力,税、费之间存在明显的“跷跷板效应”(蔡伟贤和李炳财,2021)^[85]。金税三期的实施除了产生“征税效应”以外,还产生了“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即通过降低融资方与资金供给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性,以及抑制管理层的代理行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外部融资的获取(蔡昌等,2021)^[86]。

2. 2002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与企业行为

为解决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所得税收入的弊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区域间协调发展,我国于 2002 年实施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政策规定 2002 年起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企业所得税收入,2002 年为中央分享 50%,地方分享 50%,2003 年为中央分享 60%,地方分享 40%。同时,政策还规定 2002 年以前成立的企业的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2002 年以后成立的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

该政策实施以后,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具有的征收权不变,而所得税收地方政府需按比例与中央分成,地方税务局征税努力下降,而国家税务局征税努力不变,因此,相对于国家税务局征管的企业,地方税务局征管的企业所面临的税收征管力度下降,企业实施了更多的避税行为,税负明显降低(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87]。所得税分成比例的改变,引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冲突,当地方政府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权比例大于所得税分享比例时,公司更有动机实施避税行为(Tang 等,2017)^[88]。与此同时,由国家税务局征管的企业则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的相对提升,企业内部融资难度增加,总体负债率提升,加剧了融资约束(刘行等,2017)^[89]。

3. 企业涉税信息披露政策与企业行为

现有研究关注了美国 1986 年税收改革法案(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TRA86)、美国 2007 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 48 号解释(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nterpretation No. 48, FIN48)、美国 2010 年推出的不确定性税收报告制度(Schedule UTP)和利润逐国报告制度(Country-by-country Report)等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涉税信息披露政策直接影响了企业信息披露行为,TRA86 政策要求部分企业的税收核算方法由现金制改为了应计制,该政策虽然增加了企业账面税收一致性,却减少了信息披露的信息量,加剧了信息不对称(Hanlon 等,2008)^[90]。同样,FIN48 政策和 Schedule UTP 政策对企业信息披露产生了影响,FIN48 政策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评估并公开披露所有不确定的税收风险,即公开披露税收敞口。Schedule UTP 政策则要求总资产超过阈值且财务报告存在风险敞口的向美国税务部门非公开披露相关信息,即非公开披露风险敞口。实证检验发现,FIN48 政策提升了企业信息披露成本,降低了企业披露质量(Robinson 等,2016)^[91]。而公开披露制度与非公开披露制度存在相互作用,美国税务部门对企业的关注随着 FIN48 政策要求的公开披露而增加,随着公司 Schedule UTP 政策要求的非公开披露增加而减少。Schedule UTP 政策增加了企业对税务部门的非公开披露,从而降低了公开信息披露的成本,增加了企业公开信息披露数量(Bozanic 等,2017)^[92]。

涉税信息披露政策还间接影响了企业财务决策和企业纳税行为。FIN48 政策实施后,披露更多税收不确定性的企业被银行认为具有更高的税收激进程度,从而面临更高了银行贷款成本(Hasan 等,2014)^[93]。短视的管理者为降低短期的财务报告成本,选择放弃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未来现金流优惠,从而削弱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影响了创新产出

(Williams 和 Williams,2021)^[94]。利润逐国报告制度是以反避税为目的的国际合作项目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第13项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要求跨国企业向各辖区税务部门报告经营信息,并促进各国之间报告信息共享,希望抑制企业通过利润转移避税。实证研究发现,该制度的采用降低了企业基于利润转移的避税,但可能存在其他类型避税的替代效应,对企业整体避税水平影响有限(Joshi等,2020)^[95]。

4. 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制度与企业行为

2014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取代了2003年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确立了新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并完善了配套措施。新实行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将企业纳税情况评定为A、B、C、D四个等级,并向社会披露A等级的企业名单,为A等级的企业提供多项优先或便利政策。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制度不同于金税三期,对企业并没有强制的税收征管效应,而是通过降低企业纳税行为的信息不对称,提升纳税信用高的企业声誉,补充了强制性的税收征管政策效果。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制度和配套激励政策不仅提升了企业遵从度,还促进企业信贷成本的降低,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孙雪娇等,2019)^[96]。

5. 第三方信息获取制度与企业行为

第三方信息获取制度通过获取除企业提供信息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信息,印证企业纳税申报信息的准确性,提高了企业造假成本,达到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的目的。现有文献分别检验了墨西哥1997年养老金制度改革由员工直接向税务局申报工资制度、中国20世纪末逐步推行的有奖发票制度、美国2011年以来企业信用卡交易报告制度等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均发现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信息报告的准确性,有效提升了纳税遵从度(田彬彬等,2021)^[97]。

6. 2006年中国农业税取消与企业行为

为减轻农民负担,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具有千年历史的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了冲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提升,间接影响了政府的征税努力。实证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提升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提升了辖区内企业的整体税负,影响了企业资源配置(陈晓光,2016)^[98]。

7. 省直管县改革与企业行为

我国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从两个方面影响了政府税收征管动机,一方面,省直管县改革提升了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促进政府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改革加强了县级政府自主财力,县级政府可能会通过降低税收征管的方式参与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实证检验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加强了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强度,有效抑制了企业避税动机和盈余管理行为(李广众和贾凡胜,2019)^[99]。

8. 其他税收征管政策与企业行为

除上述代表性税收征管政策以外,现有研究还检验了其他征管政策对企业财务决策、纳税行为的影响。利用中国2015年的“银税互动”政策、美国历年各州税收征管强度的外生变化等税收征管政策,验证了税收征管的“信息效应”,即税收征管降低了融资方与资金供给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性,为企业获取外部融资提供了便利(杨龙见等,2021^[100];Gallemore和Jacob,2020^[101])。以美国各州相继推出了补充条款(Addback Statutes)防止企业采用无形资产在各州之间进行收入转移为背景,发现该政策减少了公司可以从创造专利等无形资产中获得的税收优惠,降低了公司专利产出数量和引用率,阻碍了创新行为(Li等,2021)^[102]。以澳大利亚公开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纳税申报表、美国证监会对企业的税收评论信、智利税务局对公司随机发出的加强税收征管威慑信件等税收征管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发现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检验受控外国子公司规则(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CFC)、西班牙对收入超过600万欧元的公司实施的大型纳税单位政策等具有门槛的税收征管政策的效果,发现企业为规避达到征管门槛而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提升,有动机进行以避税为目的的会计调整。

四、企业利益相关者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

企业利益相关者税收政策通过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对企业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如股东税收政策可能会引发股东对企业行为的干预;在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背景下,对员工税收政策的变动可能会影响企业成本,从而导致企业行为的改变;另有研究发现对储户的税收政策影响了银行贷款行为。

1. 股东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

(1)美国 2003 年股息税减免与企业行为。2003 年,美国颁布了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与和解法案(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and Reconciliation Act, JGTRRA),宣布将美国联邦股息税税率从最高 38.6% 降至 15%,将个人投资者的长期资本利得税税率从最高 20% 降至 15%。股息税的削减会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相对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JGTRRA 法案降低了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公司降低了对债务融资的使用,公司杠杆率下降(Lin 和 Flannery, 2013)^[103]。股息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基于两个不同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股息税率的减免降低了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促进了企业投资;另一种理论则认为企业投资来自利润留存,股息税的减免促进了企业利润分配,可能会导致利润留存的下降,从而抑制企业投资。实证检验发现股息税减免政策对企业投资促进作用有限,有学者发现 JGTRRA 法案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即企业新增边际投资来自留存收益和无风险债务,而不是新发行的股权或风险债务,降低股息税同时增加了原有业务的收益和税后投资回报的机会成本,因此政策对企业投资没有显著影响(Yagan, 2015)^[104],对 2006 年瑞典的股息税减免政策的实证检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理论上,股息税率的降低激励了企业利润分配行为,但企业代理问题的加剧将导致股息税减税政策对企业股利支付的影响明显降低(Jacob 和 Michaely, 2017)^[105]。

(2)中国 2012 年股利税改革与企业行为。2012 年我国对原有的股利税进行改革,将 2005 年颁布的股利所得税税率减按 10% 征收政策改为按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差异化税率的征收政策,对于持股时间为 1 个月内、1 个月至 1 年、1 年以上的,分别按 20%、10% 和 5% 税率征收股利所得税。在个人投资者占多数的中国市场,股利税改革影响了投资者的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从而显著影响企业决策。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的上市公司,政策颁布后股利税率越低,更有可能增加股利支付(Li 等, 2017)^[106],同时,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显著提高了受益公司的股权融资比重(刘行等, 2015)^[107]。此外,通过将个人投资者税率与持有时间挂钩,抑制了个人投资者的短期交易,降低了股票异常波动,稳定了市场(Li 等, 2021)^[108]。

(3)其他股东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现有文献还研究了其他股东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和纳税行为的影响,如以美国和德国的资本利得税减免政策为背景,发现资本利得税的减免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和并购;以香港 2006 年遗产税改革和希腊 2002 年降低继承税改革为背景,发现对家族企业控股股东遗产继承行为的征税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和劳动力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以韩国赠予税改革为背景,发现对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征税可以有效抑制企业以避税为目的的会计调整行为。

2. 员工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

雇主给雇员发放工资时往往需要代扣代缴有关税费,员工税收政策的变化将影响企业成本,进而改变企业行为。有关员工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实证证据较少,仅有少量英文文献检验了工薪税政策对企业薪酬政策的影响(如 Saez 等, 2019)^[109],员工税收政策冲击对企业其他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3. 客户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

客户税收政策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企业客户的行为,企业面临经营状况的改变,从而影响企业

行为。有关客户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实证证据较少,Carletti等(2021)^[110]分析了2011年意大利降低个人银行存款利息税率外生事件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促使居民用银行存款替代银行债券投资,这显著影响了银行的资本比率和信贷政策。

五、总结、评述与展望

1. 总结

本文全面梳理了国内外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的税收政策研究文献,将税收政策分类为企业税收政策、税收征管政策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税收政策,并分别从企业财务决策、信息披露、纳税行为、企业行为综合表现、企业其他行为等方面揭示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真实影响。

企业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对国内外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关税和环保税政策进行了研究。以税制优化和减税降费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经营现金流、降低企业税负为主线,现有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的企业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大部分实证研究均表明税制优化和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财务决策、纳税行为和企业行为综合表现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作用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减税政策后税收征管部门的行为,内部因素则包括企业自身议价能力、融资约束、机构治理等。在企业纳税行为方面,现有研究为门槛型、期限型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下的企业会计调整和利润转移行为提供了证据。

税收征管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研究了国内外不同类型的税收征管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税收征管强度变化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为主线,现有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提高了企业纳税成本,减少了避税行为,规范了信息披露,但税收负担的加重可能会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和综合表现产生负向影响,而税收征管强度的降低将引发更多的企业避税行为。同时,不同类型的税收征管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尽相同,以金税三期、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政策为企业带来了“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通过提升信息披露水平,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和综合表现产生了正向影响。以FIN48政策为代表的涉税信息披露政策将影响企业信息披露成本,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税收遵从度的提升也有显著作用。

企业利益相关者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从股东税收政策、员工税收政策和客户税收政策三个方面展开。股东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多样性,一方面,股息税的减免降低了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对企业投资和股利分配带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遗产税可能会对家族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而现有文献对员工税收政策和客户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探索。

2. 评述

随着税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实证文献不断增多,这为税收改革的持续推进和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归纳总结已有文献,本文认为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 准自然实验的滥用和稳健性检验不足。准自然实验方法能够较好的解决内生性问题,更好地对税收政策与公司行为进行因果推断,但现有文献仍然存在准自然实验的滥用和结果稳健性检验不足的问题。尽管目前文献采用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验证准自然实验方法的适用性,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匹配特征相近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但对税收政策的外生性,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合理选择,是否能被企业预期,是否存在同期的其他政策影响等问题关注不够,如何确保税收政策效应的“干净”可信,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依然值得后续研究关注。

(2) 基于各国特色的制度和文化的税收政策差异性效果尚未呈现。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这不仅会影响税收政策制定,还会影响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现有文献注重对税收政策实

施效果的评估以及利用税收政策对现有理论的检验,但却容易忽略不同国家的制度和差异对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影响,缺乏对特殊制度和差异对税收政策潜在影响机制的挖掘,从而难以提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政策建议。

(3)数据库有待完善。有关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实证研究,对数据具有依赖性。如企业的税收数据,部分文献采用公司公开财务报告数据,但这些数据存在不全面、遗漏等问题,而大部分发表于国内外顶级刊物的文献采用来自征管部门的行政数据,行政数据拥有数据较为完善、可信度较高的特点,但不是公开可得的。部分政策实施数据和企业税收数据具有保密性的特点,获取存在门槛,是促进该领域深入研究亟待克服的难题。

3. 展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研究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对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尽管已有大量文献检验了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方面,由于识别策略和估计方法的差异导致了结论的分歧,例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结构和债务风险管理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足,未能识别不可观测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而导致未能正确解释实证结果的差异,如在研究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时忽略了企业由于议价能力导致的税负转嫁问题;除此以外,由于制度环境等因素不同,现有文献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已知理论出现分歧,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导致企业投资增加的实证结果与认为该政策仅改变企业现金流而不影响投资决策的理论不符。因此,为减少研究分歧,研究者需要不断精进实证策略,进一步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结合制度环境,分析税收政策实施效果差异。结合现有研究,本文对未来研究提以下三点展望。

(1)准实验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创新研究方法的探索。传统双重差分模型在估计多期处理效应时,除了要满足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行趋势假设,还需要满足处理效应在不同时间与不同组之间无差异的假设,才能得到平均处理效应的无偏估计。而对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营改增等逐步试点推广的政策无法保证不同时间与不同组之间的无差异假设,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可能是导致现有实证检验结论出现分歧的原因。

近年来,准实验研究方法不断改进,有学者提出了应用于没有组完全未被干预,也没有组完全被干预,只是存在某些组比其他组政策干预率增加更多情境下的模糊 DID 估计方法 (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 2017)^[111];有学者提出了针对多期情境下处理效应存在异质性 (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 2020)^[112] 和动态性 (Callaway 和 Sant'Anna, 2021)^[113] 的估计方法,以及诊断多期 DID 系数偏差的 Bacon 分解等 (Goodman-Bacon, 2021)^[114],克服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

除了改进现有研究方法以外,研究方法的创新可以拓展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的研究内容。如聚束 (Bunching) 方法的应用能够识别某一门槛处的集聚效应,有助于对门槛型税收优惠或税收征管政策的研究;结构估计 (Structural Estimation) 方法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对不同税收改革方案进行政策模拟,有助于对税收政策的改进;对企业公开披露信息的文本分析可以更好地捕捉企业行为,从而更好地分析企业对税收政策的真实反应。因此,对准实验方法的改进与创新研究方法的适用,有助于完善现有研究。

(2)运用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研究的深度上看,现有文献大多局限于评价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直接经济后果,对其影响机制的深入发掘较少。从研究的广度上看,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投资和企业避税行为,税收政策的选择则集中在增值税转型改革、营改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

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者得以突破专业学科限制,深入探索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解释实证结果的分歧,例如通过企业议价能力引发的税收转嫁能力差异,解释了流转税政策对企业税

负带来的不同影响,通过企业代理问题,解释降低股息税政策对企业利润分配行为的差异等。因此,在评估税收政策实施效果或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时,要充分结合行为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洞察不同税收政策下企业的应对举措,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3)基于中国国情,检验现有税收政策实施效果,并积极探索优化方案。对税收政策理论研究注重从理论层面对对税收制度进行设计,而实证研究能够评估税收政策的实施效应,对理论进行检验。因此,实证文献在注重对税收政策实施效果的检验同时,还应积极结合已有理论研究,并结合中国国情,探索税收优化方案,为税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 [1] 刘克崮. 1994年前后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J].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2009,(4):4-24.
- [2] 马海涛,王紫薇,黄然. 我国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评估——对政府收支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 北京:经济研究参考,2020,(13):5-19.
- [3] Hanlon, M., and S. Heitzman.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 (2-3):127-178.
- [4] Ljungqvist, A., and M. Smolyansky. To Cut or Not to Cut?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Taxes on Employment and Income[R]. Working Paper, 2014.
- [5] 刘啟仁,赵灿,黄建忠. 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J]. 北京:管理世界,2019,(1):78-96,114.
- [6] Modigliani, F., and M. H. Miller.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 (3):261-297.
- [7] 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 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J]. 北京:经济研究, 2020,(6):105-121.
- [8] 刘啟仁,赵灿. 税收政策激励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J]. 北京:经济研究,2020,(4):70-85.
- [9] 范文林,胡明生.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短贷长投[J]. 北京:经济管理,2020,(10):174-191.
- [10] 申慧慧,于鹏. 税法折旧与公司投资结构[J]. 北京:会计研究,2021,(2):133-148.
- [11] 李建强,赵西亮.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资本劳动比[J]. 北京:财贸经济,2021,(4):67-82.
- [12] 刘行,叶康涛,陆正飞. 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 北京:经济学(季刊),2019,(1):213-234.
- [13] 刘怡,侯思捷,耿纯. 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基于东北三省税收政策的研究[J]. 北京:财贸经济,2017,(6):5-16,114.
- [14] Zwick, E., and J. Mahon. Tax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Investment Behavio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 (1):217-248.
- [15] Park, J. The Impact of Depreciation Savings o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orporate Alternative Minimum Tax[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6, 135:87-104.
- [16] Maffini, G., J. Xing, and M. P. Devereux.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UK Corporation Tax Returns[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9, 11, (3):361-389.
- [17] Gucer, I., and M. Albinowski. Investment Responses to Tax Policy under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1, 141, (3):1147-1170.
- [18] 袁业虎,沈立锦.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降杠杆吗?——基于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J]. 北京:税务研究,2020,(10):92-99.
- [19] 崔也光,王京. 基于我国三大经济区的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研究[J]. 北京:税务研究,2020,(2):92-98.
- [20] 梁富山. 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效应研究[J]. 北京:税务研究,2021,(3):134-143.
- [21] 王玺,刘萌.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北京:财政研究, 2020,(11):101-114.
- [22] 杨国超,芮萌.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J]. 北京:经济研究,2020,(9):174-191.
- [23] Chen, Z., Z. Liu, J. C. Suárez Serrato, and D. Y. Xu. Notching R&D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11, (7):2065-2100.
- [24] 魏紫,姜朋,王海红.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J]. 北京:财政研究,2018,(11):96-106.

- [25] 李昊楠, 郭彦男. 小微企业减税、纳税遵从与财政可持续发展[J]. 北京: 世界经济, 2021, (10): 103 - 129.
- [26] 李昊楠. 减税效率的提升路径——来自结构性减税时期小微企业应税收入弹性的证据[J]. 北京: 管理世界, 2021, (11): 90 - 105, 7, 106 - 110.
- [27] 樊勇, 李昊楠, 管淳.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间断点是否存在集聚效应[J]. 北京: 世界经济, 2020, (3): 167 - 192.
- [28] Gaggl, P., and G. C. Wright. A Short-run View of What Computers Do: Evidence from a UK Tax Incentiv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7, 9, (3): 262 - 294.
- [29] Fajnzylber, P., W. F. Maloney, and G. V. Montes-Rojas. Does Formality Improve Micro-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Brazilian SIMPLES Program[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4, (2): 262 - 276.
- [30] Rocha, R., G. Ulyssea, and L. Rachter. Do Lower Taxes Reduce Informa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4: 28 - 49.
- [31] Monteiro, J. C., and J. J. Assunção. Coming Out of the Shadows?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Bureaucracy Simplification and Tax Cut on Formality in Brazilian Microenterpris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9, (1): 105 - 115.
- [32] Piza, C. Out of the Shadows? Revisiting the Impact of the Brazilian SIMPLES Program on Firms' Formalization Rat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4: 125 - 132.
- [33] 郑宝红, 张兆国. 企业所得税率降低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吗?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北京: 会计研究, 2018, (5): 13 - 20.
- [34] 包群, 但佳丽, 张志强. 外资身份的重要性: 基于外资股权限定的经验分析[J]. 北京: 世界经济, 2020, (7): 73 - 97.
- [35] 毛程连, 吉黎. 税率对外资企业逃避税行为影响的研究[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4, (6): 73 - 89.
- [36] 刘冲, 李明, 张吉光. 税收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研究——银行资本结构的视角[J]. 北京: 经济学(季刊), 2021, (6): 2017 - 2036.
- [37] 曲顺兰, 武嘉盟. 慈善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效果评价[J]. 北京: 税务研究, 2017, (3): 31 - 37.
- [38] 彭飞, 范子英. 税收优惠、捐赠成本与企业捐赠[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6, (7): 144 - 167.
- [39] 黄炳艺, 林嘉伟, 王艳艳. 资本弱化税制与外资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研究[J]. 天津: 管理科学学报, 2020, (4): 38 - 54.
- [40] Ohn, E.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Taxation 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DPAD[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8, 10, (2): 272 - 301.
- [41] Lester, R. Made in the USA? A Study of Firm Responses to Domestic Production Incentiv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9, 57, (4): 1059 - 1114.
- [42] Blouin, J. L., E. M. Fich, E. M. Rice, and A. L. Tran. Corporate Tax Cuts, Merger Activity, and Shareholder Wealt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21, 71, (1): 101315.
- [43] Desai, M. A., C. F. Foley, and J. R. Hines Jr. Trade Credit and Tax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6, 98, (1): 132 - 139.
- [44] Dharmapala, D., C. F. Foley, and K. J. Forbes. Watch What I Do, not What I Say: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Homeland Investment Act[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 (3): 753 - 787.
- [45] Faulkender, M., and M. Petersen. Investment and Capital Constraints: Repatriations under the American Jobs Creation Act[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2, 25, (11): 3351 - 3388.
- [46] Grieser, W., and Z. Liu.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Competitor Constraint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32, (11): 4271 - 4303.
- [47] Mukherjee, A., M. Singh, and A. Žaldokas. Do Corporate Taxes Hinder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4, (1): 195 - 221.
- [48] Chow, T., S. Huang, K. J. Klassen, and J. Ng.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Income Taxes on Investment Location: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Headquarters Relocations[J]. *Management Science*, 2022, 68, (2): 1404 - 1425.
- [49] Atanassov, J., and X. Liu. Can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Stimulate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20, 55, (5): 1415 - 1465.
- [50] Ljungqvist, A., L. Zhang, and L. Zuo. Sharing Risk with the Government: How Taxes Affect Corporate Risk Tak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 55, (3): 669 - 707.
- [51] Smolyansky, M. Policy Externalities and Banking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9, 132, (3): 118 - 139.
- [52] Kang, Y., O. Z. Li, and Y. Lin. Tax Incidence in Loan Pric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21, 72, (1): 101418.
- [53] Kohlbase, S., and J. Pierk. The Effect of a Worldwide Tax System on Tax Management of Foreign Subsidia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0, 51, (8): 1312 - 1330.

- [54] Feld, L. P., M. Ruf, U. Scheuering, U. Schreiber, and J. Voget. Repatriation Taxes and Outbound M&A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6, 139: 13 – 27.
- [55] Amberger, H. J., K. S. Markle, and D. M. Samuel. Repatriation Taxes, Internal Agency Conflicts, and Subsidiary-level Investment Efficienc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1, 96, (4): 1 – 25.
- [56] Liu, L., T. Schmidt-Eisenlohr, and D. Guo. International Transfer Pricing and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Linked Trade-tax Statistics in the United Kingdom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0, 102, (4): 766 – 778.
- [57] Doidge, C., and A. Dyck. Taxes and Corporate Policies: Evidence from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 (1): 45 – 89.
- [58] 申广军, 张延, 王荣. 结构性减税与企业去杠杆 [J]. *北京: 金融研究*, 2018, (12): 105 – 122.
- [59] 刘行, 赵健宇.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J]. *北京: 会计研究*, 2019, (9): 43 – 49.
- [60] 许伟, 陈斌开. 税收激励和企业投资——基于 2004 ~ 2009 年增值税转型的自然实验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6, (5): 9 – 17.
- [61] 赵仁杰, 范子英. 税费替代: 增值税减税、非税收入征管与企业投资 [J]. *北京: 金融研究*, 2021, (1): 71 – 90.
- [62] 李成, 陈智, 叶颖玫. 融资约束视角下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政策效应研究 [J]. *北京: 财政研究*, 2016, (1): 93 – 103.
- [63] 谢申祥, 范鹏飞. 增值税全面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机理 [J]. *北京: 财政研究*, 2020, (12): 73 – 91.
- [64] 王跃堂, 倪婷婷. 增值税转型、产权特征与企业劳动力需求 [J]. *天津: 管理科学学报*, 2015, (4): 18 – 37, 48.
- [65] 蒋为. 增值税扭曲、生产率分布与资源误置 [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6, (5): 54 – 77.
- [66] 李成, 张玉霞. 中国“营改增”改革的政策效应: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J]. *北京: 财政研究*, 2015, (2): 44 – 49.
- [67] 申广军, 陈斌开, 杨汝岱. 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 ——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 (11): 70 – 82.
- [68] 彭飞, 许文立, 吕鹏, 吴华清. 未预期的非税负担冲击: 基于“营改增”的研究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20, (11): 67 – 83.
- [69] 陈钊, 王旸. “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6, (3): 36 – 45, 59.
- [70] 岳树民, 肖春明. 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上市公司的证据 [J]. *北京: 税务研究*, 2017, (7): 11 – 18.
- [71] Jacob, M., R. Michaely, and M. A. Müller. Consumption Taxe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32, (8): 3144 – 3182.
- [72] Benzarti, Y., and D. Carloni. Who Really Benefits from Consumption Tax Cu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VAT Reform in France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9, 11, (1): 38 – 63.
- [73] 寇恩惠, 刘柏惠, 张醒. 增值税负担机制研究——来自采矿业税率改革的证据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21, (10): 105 – 121.
- [74] 吴怡俐, 吕长江, 倪晨凯. 增值税的税收中性、企业投资和企业价值——基于“留抵退税”改革的研究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21, (8): 180 – 194.
- [75] Chandra, P., and C. Long. VAT Rebates and Export Performance in China: Firm-level Evidenc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3, 102: 13 – 22.
- [76] 田巍, 余森杰.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 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4, (6): 90 – 112.
- [77] 邵朝对. 进口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来自中国加入 WTO 的准自然实验 [J]. *北京: 经济学(季刊)*, 2021, (5): 1615 – 1638.
- [78] 毛其淋, 许家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 ——来自中国的证据 [J]. *北京: 经济学(季刊)*, 2017, (2): 485 – 524.
- [79] 陈建涛, 吴茵茵, 陈建东. 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行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J]. *北京: 税务研究*, 2021, (11): 44 – 49.
- [80] 金友良, 谷钧仁, 曾祥辉. “环保费改税”会影响企业绩效吗? [J]. *北京: 会计研究*, 2020, (5): 117 – 133.
- [81] Klier, T., and J. Linn. Using Taxes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Rates of New Passenger Vehicles: Evidence from France, Germany, and Sweden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5, 7, (1): 212 – 242.
- [82] 李增福, 路展聪, 杜玲, 汤旭东. “信息机制”还是“成本机制”? ——大数据税收征管何以提高了企业盈余质量 [J]. *北京: 会计研究*, 2021, (7): 56 – 68.
- [83] 樊勇, 李昊楠. 税收征管、纳税遵从与税收优惠——对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评估 [J]. *北京: 财贸经济*, 2020, (5): 51 – 66.
- [84] 李艳, 杨婉昕, 陈斌开. 税收征管、税负水平与税负公平 [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1): 24 – 41.
- [85] 蔡伟贤, 李炳财. 税收征管、税收压力与企业社保遵从 [J]. *北京: 世界经济*, 2021, (12): 201 – 224.
- [86] 蔡昌, 林高怡, 王卉乔. 税收征管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分析 [J]. *北京: 会计研究*, 2021, (5): 107 – 120.
- [87] 范子英, 田彬彬. 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3, (9): 99 – 111.
- [88] Tang, T., P. L. L. Mo, and K. H. Chan. Tax Collector or Tax Avoider? An Investig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Agency Conflict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7, 92, (2): 247 – 270.
- [89] 刘行, 赵健宇, 叶康涛. 企业避税、债务融资与债务融资来源——基于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断点回归分析 [J]. *北京: 管*

理世界,2017,(10):113-129.

[90] Hanlon, M., E. L. Maydew, and T. Shevlin.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Book-tax Conformity: A Loss of Earnings Informativenes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8,46,(2-3):294-311.

[91] Robinson, L. A., B. Stomberg, and E. M. Towery.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How the Uniform Rules of FIN 48 Affect the Relevance of Income Tax Accounting[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6,91,(4):1195-1217.

[92] Bozanic, Z., J. L. Hoopes, J. R. Thornock, and B. M. Williams. IRS Atten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7,55,(1):79-114.

[93] Hasan, I., C. K. S. Hoi, Q. Wu, and H. Zhang.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on the Cost of Bank Loa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4,113,(1):109-130.

[94] Williams, B., and B. M. Williams.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ax Law and Accounting Standards[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21,96,(6):397-425.

[95] Joshi, P., E. Outslay, A. Persson, T. Shevlin, and A. Venkat. Does Public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Deter Tax Avoidance and Income Shifting?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Banking Industry[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20,37,(4):2357-2397.

[96] 孙雪娇, 翟淑萍, 于苏. 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2019,(3):81-99.

[97] 田彬彬, 杨健鹏, 汪丹, 叶菁菁. 第三方信息获取与税收征管效率: 来自有奖发票推行的证据[J]. 北京: 世界经济,2021,(9):103-124.

[98] 陈晓光.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地区不平等[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2016,(4):53-70,206.

[99] 李广众, 贾凡胜. 政府财政激励、税收征管动机与企业盈余管理——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的研究[J]. 北京: 金融研究,2019,(2):78-97.

[100] 杨龙见, 吴斌珍, 李世刚, 彭凡嘉. “以税增信”是否有助于小微企业贷款? ——来自“银税互动”政策的证据[J]. 北京: 经济研究,2021,(7):96-112.

[101] Gallemore, J., and M. Jacob. Corporate Tax Enforcement Externalities and the Banking Sector[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20,58,(5):1117-1159.

[102] Li, Q., M. S. Ma, and T. Shevlin. The Effect of Tax Avoidance Crackdow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21,71,(2-3):101382.

[103] Lin, L., and M. J. Flannery. Do Personal Taxes Affect Capit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the 2003 Tax Cut[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109,(2):549-565.

[104] Yagan, D. Capital Tax Reform and the Real Economy: The Effects of the 2003 Dividend Tax Cu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12):3531-3563.

[105] Jacob, M., and R. Michaely. Taxation and Dividend Policy: The Muting Effect of Agency Issues and Shareholder Conflict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7,30,(9):3176-3222.

[106] Li, O. Z., H. Liu, C. Ni, and K. Ye. Individual Investors' Dividend Taxes and Corporate Payout Polici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7,52,(3):963-990.

[107] 刘行, 张艺馨, 高升好. 股利税与资本结构: 中国的经验证据[J]. 北京: 会计研究,2015,(10):66-73,97.

[108] Li, O. Z., H. Liu, and C. Ni. Dividend Taxes, Investor Horizon, and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21,96,(3):403-430.

[109] Saez, E., B. Schoefer, and D. Seim. Payroll Taxes, Firm Behavior, and Rent Sharing: Evidence from a Young Workers' Tax Cut in Swede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9,109,(5):1717-1763.

[110] Carletti, E., F. De Marco, V. Ioannidou, and E. Sette. E. Banks as Patient Lenders: Evidence from a Tax Reform[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21,141,(1):6-26.

[111] de Chaisemartin, C., and X. D'Haultfoeuille. Fuzzy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8,85,(2):999-1028.

[112] de Chaisemartin, C., and X. D'Haultfoeuille. Two-way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0,110,(9):2964-2996.

[113] Callaway, B., and P. H. Sant'Ann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21,225,(2):200-230.

[114] 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21,225,(2):254-277.

Tax Policies and Corporate Behaviors: A Review Based 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Literature

LI Xiao-rong^{1,2}, YE Chu-hao¹, MA Hai-tao³

(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Beijing, 102206, China;

2. ZHONGCAI-CSCI Pengyuan Local Finance Investment and Funding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2206, China;

3.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ax policy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government to regulate market and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invest and innovate which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rporate behaviors. Recently, the number of articles using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method is increasing due to its advantages in casual inference. Generally, there are two main challenges when us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ax policies. First, changes in tax policy are unlikely to be random and instead may themselves be influenced by prevail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other factors. Second, researchers can't observe counterfactual outcomes. The empirical strategy designed by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can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effectively. This study aims to review these literature, summarize the impact of tax policies on corporate behaviors and give suggestions for policy-makers and future studies.

This study firstly selects articles from import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journals in the past ten years which employing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metho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ax policies on corporate behaviors, including 91 articles in English and 131 in Chinese. All this articles were read carefully to identify and categorize tax policies and the corporate behaviors. The tax polici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which are corporate tax policies,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and corporate stakeholder tax policies. The corporate behaviors are categorized into five groups which are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axation behavior,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nd other corporate behaviors.

Nex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impact of tax policies on the each of corporate behaviors mention above. Based on experimental evidences, this study summariz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for each tax policy category to corporate behaviors. In terms of corporate tax policies, it usually aims at reducing tax rates, providing tax incentives and encouraging corporate investment, mos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t provides extra cash flow and promote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R&D. In terms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will directly effect the intensity of tax enforcement. When the intensity of tax enforcement increases, corporate will be less aggressive in tax planning, face strong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contrary, when it decreases, corporate will be more aggressive in tax planning, decrease R&D investment and cause agency problems which usually leads to a decline i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ast, in terms of corporate stakeholder tax policies, many articles provide evidences show that the tax policies for corporate stakeholders will indirectly effect corporate behaviors. For instance, experimental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tax policies for corporate manager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investors could affect corporate behaviors.

Finally, this study makes comments about the articles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re are three points that researchers need pay attention to: (1) There may exist problems that misuse of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and insufficient robustness checks. (2) Different countries may have different system of 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It will not only effect the formulation of tax policy but also the implement. However many articles tend to ignore it. (3) Due to the confidentiality of some tax data, the database of tax policies and corporation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is study also giv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1) Improve existing empirical methods and explore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s, try to use improved method and new effective methods like bunching method and structural estimation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methods. (2) Apply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methods, try to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ax policy research. (3) Based on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ulture, tes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existing tax policies, and try to explore optimization plans.

Key Words: tax policy; corporate behavior;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JEL Classification: G30, H20, M00

DOI: 10.19616/j.cnki.bmj.2022.10.011

(责任编辑:闫梅)